

作者是怎么确定的？

**卜正民：**最初的想法是每一卷的时间跨度大体相同，三至四世纪。我们也会按照中国传统朝代划分，因为这就是中国历史产生的根源。因为有了朝代，中国人开始思考他们在历史河流中的位置。最让人惊讶的，我认为是将汉唐之间的南北朝时期单独归于一卷。以前常见的做法是比较简略，比如其中一两个朝代综合起来一起论述，但其实即使是非常短暂的朝代，也会如此不同于它之前或之后的时代，应该得到单篇论述的待遇。毫不奇怪，它是在西方销售情况最不好的一卷，因为它写到了大多数西方读者非常陌生的那一段中国历史。

**《新民周刊》：**《哈佛中国史》的全球史视角是这套书的一大特色，您觉得以全球史视角来书写中国，是向世界解释中华文明，还是以世界眼光来改写中国历史？

**卜正民：**都是。我请这套书所有的作者意识到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广泛得多，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能为中国历史所做

的事。在这套《哈佛中国史》中，我们将其置于全球史的维度中，说明中国是由什么塑造而成的，不论是内在因素还是外在因素。同时，我觉得西方的读者会发现，不局限于中国本身，而是将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审视可以让它们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新民周刊》：**从《挣扎的帝国》开始，您就非常重视气候环境对历史的影响，您提出：“明朝没落原因之一是环境危机。”万历二十八年—崇祯十六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五个小冰河期，但是天顺二年—嘉靖三十一年这中国第四个小冰河期也没有导致明朝灭亡。而我对粮食、人口和政治的关系比较感兴趣，人口的暴增是清朝太平天国运动的一个重要导火索，您觉得环境的根本问题是不是人口与粮食之间矛盾的问题？

**卜正民：**我不认为气候是塑造国家和社会状况的最根本力量，但我相信它不容忽视。气候本身并不能解释任何事情。国家的崛起和衰落，社会变得富裕或贫困，思想和

艺术的繁荣或萧条，是因为人们作出的决定，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的决定。如果我在《挣扎的帝国》那一卷中强调环境因素，那是因为明代的衰落是一个气候变化给社会造成极端压力的典型案例。当然，明朝在1644年的灭亡有很多原因，只有部分原因是气候威胁到了基本的生存。到处都有人在学习如何适应变化，但明末饥荒十分严重，持续了很久，努力适应已无济于事。通过比较，天顺、嘉靖年间饥荒是相对短暂的，人们可以度过糟糕的一年，但能否在五年的大饥荒中幸存则完全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将最糟糕的时期称之为“深渊”：这不仅仅是饥荒，而饥荒与其它危机共同持续了好几年。

**《新民周刊》：**您被誉为“北美最会讲故事的历史学家之一”，对此您本人怎么看？

**卜正民：**我很高兴读者能接受我的作品。著述时能抓住读者的关注点，得到他们的信任一直是我追求的目标。我在大学里教文学，仍然把写作作为一门手艺。然而，我不为自己而写，我的目标始终是：写作应该引导读者阅读，以便读者能欣赏我基于原始材料所构建出的文章，能够接受我的论断。你是对的，注意到我的写作技巧，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就是由一些看似小的微不足道的细节推导出一个大的观点。部分原因是由于我对描写真实的人的生活更感兴趣，我不认为历史书应该写给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读者，也不认为应该将日常生活用作历史阐释的工具。这也就是说，讲故事，是引起读者兴趣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其它。☒

左图：卜正民在温哥华西海岸。

